

杨圻《江山万里楼诗钞》 “南洋拓境”的特色

[马来西亚]谭勇辉*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中文系, 马来西亚)

摘 要 杨圻《江山万里楼诗钞》的南洋纪游诗在南洋华人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杨圻运用中国传说故事与文学母题,营造出南洋“桃源仙境”,颠覆了“蛮夷瘴癘之邦”的既定印象。此外,杨圻从热带的昼夜温差中,发掘出契合中国传统诗歌审美意趣的境界,在闲散幽静的基本诗风上发展出清旷超逸的特色,印证了诗境之开拓得力于“江山之助”的观点。

关键词 杨圻《江山万里楼诗钞》; 南洋华人诗歌; 星洲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491(2015)02-0063-06

DOI:10.16275/j.cnki.ywsk.2015.02.013

前 言

中国古代文士因种种不同的机遇而有幸游历异域,他们在开拓眼界之余也将景物写入诗文之中。在诗人眼里,异域风光是不可多得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都备受关注。与中土接壤的西域、蒙古、朝鲜半岛以及一水之隔的日本,至少在唐之前已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题材。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洋^①,其进入中国古典诗词领域的时间要晚至明代以后。在明代航海家费信《星差胜览》、清代斌椿《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王芝《海客日谭》这几本南洋游记中,开始夹杂着一些吟咏南洋风物的诗歌,但还不是真正诗人的作品。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海禁开放,华民大量奔赴南洋谋生,旅寓诗人随之增加,如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杨圻等中国著名诗人,都在南洋写下许多精彩的诗篇,共同掀开了南洋华人诗歌史的扉页。

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杨圻(1875-1941),“字

云史,初名朝庆,易名鉴莹,复改今名,江苏常熟人”(陈瀛一:《杨云史先生家传》^[1] P694),以诗名著称于晚清民国时期。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至清朝灭亡期间,杨圻经外务部奏充南洋领事,驻新加坡,写下了许多相关作品,而这些作品都收录在《江山万里楼诗钞》和《江山万里楼词钞》。根据李庆年的统计,诗集中卷二《壮年集》(丁未迄庚戌)与卷三《壮年集》(庚戌迄辛亥)分别有62首与109首作于新加坡;另外,词集中卷三《海山词》66阙全作于新加坡,卷四《望帝词》亦有2阙作于新加坡,可说数量相当之可观^②。上世纪末,学者开始对这些作品给予关注,如专著方面有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其将杨圻的相关诗词纳入第四章“辛亥革命前十年的马华旧体诗”中进行概述。在单篇论文方面,则有郑园《乱世飘蓬一诗人——杨圻诗歌论》^[2],仅将杨圻的南洋诗歌作为其中一个论述

* 作者简介:谭勇辉(1982-)男,马来西亚华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① 按:本文的“南洋”指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② 参见李庆年《马来亚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5页。

要点。

杨圻与黄遵宪、康有为、邱逢甲涉足南洋的时间范围,大抵集中在清亡前二十年间。诗人们在开拓“南洋诗境”之时,虽然满怀着雀跃一试的喜悦;但是,在缺少前人“南洋”抒写传统可供遵循与参照的窘境下,他们必定也曾饱尝惨淡经营的滋味。毕竟中国古典诗词发展到晚清,其题材与风格等方面已经十分完备成熟,诗人若想要开拓诗境,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借着身处异域的机会,使新奇之事物经由感官引起心灵深处的激荡。正是因为如此,杨圻等人在南洋华人诗歌发展史上的开拓意义也就显得更加重要。然而在这个课题上,杨圻所获得的重视与关注明显要少于黄、康、邱三人。其实,若要全面了解早期南洋华人诗歌在承接中华传统之余如何进一步拓展,杨圻这一环可说不容忽视;再加上杨圻的“宗唐”审美取向,使得他笔下的南洋诗篇渲染出异于其他三人的色彩,故理应受到相等的关注与研究。笔者拟以《江山万里楼诗钞》^①的南洋纪游诗作为研究范围,从中归纳出最能代表杨圻抒写特色的两点进行论述,借此揭示他在“南洋拓境”上的努力尝试。

一 仙源情结

在古代,“蛮荒瘴疠之邦”本来是中原人士对岭南地区的诠释^②,而远在国境千里之外、地理位置更加偏南的南洋地区,自然更加难逃“黑名单”之列^③。虽然中国与南洋的交流史早在汉代便已掀开帷幕,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涉足那里的基本上是外交使臣、僧人、商人这几类人群^④;而一心想报效家国的士大夫与安土重迁的农民,也许大部分都未曾想过要离开相对富足舒适的神州大地。然而,这种情况维持到清朝下半叶便开始动摇。清廷腐败,内忧外患频仍、民不聊生之际,刚好又碰上英殖民政府在南洋广招大量华工;于是,来自中国各地尤其是闽粤地区的穷苦农民,纷纷离乡背井,踏上“下南洋”的辛酸历程。

在这股迁徙的大潮流中,其实并不乏文人墨客

的参与,他们奔赴南洋不单是为了觅职谋生,有时还包含处理差事、游览风光、探访亲友等不同的目的;而且,其各自所抱持的心态也不尽相同。像杨圻,表面上是为了出任清廷驻新领事馆翻译官员,实际上内心还隐藏着一段苦衷。在《江山万里楼诗钞卷二卷三跋》中,杨圻清楚交代了他奔赴星洲的缘由与心情:

吾惧夫习俗移人,既无以用,转失所抱。闻南夷岛国有海山之胜,中国人数十万居之,有子孙焉。心壮而慕之,乃于外部求为译吏于南溟之星洲^⑤。……昔东坡居儋耳,子厚居柳州,其言多愤懑忧怨,仆非迁谪,宜无所哀,且得其乐矣。”[1](P683-684)

在经世致用之才无法施展的窘境下,杨圻毅然从晚清腐败的政治氛围中自我抽离出来,希望在海阔天空的南夷岛国之中寻找喘息的机会。这虽与陶渊明挣脱樊笼、归隐田园的情况有些相似,但不同的是杨圻选择了比较折中的“吏隐”方式,一方面让自己与朝廷保持在若即若离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能独善其身,满足崇尚淡泊宁静生活的性情^⑥。为了突显这决定的积极性,杨圻还跟苏轼、柳宗元作了比较,表示自己并非逐臣,即使到了比岭南远上几倍的星洲,心情依然是充满喜悦与期待之情的。

这份喜悦与期待之情,充分反映在杨圻的南洋抒写之中。就整装待发、扬帆起航到旅居星洲这一过程而言,杨圻擅长从古老的寓言、传说与文学母题中吸取元素,为南洋的背景环境营造了很好的氛围。

自题种树图照

男儿富贵须及少年时,年过三十不得志。便当抱真守天姿,清庙明堂有大器。自我之生矣非所宜,翱翔南溟兮,云水苍茫之湄。深山大泽兮,种白榆以疗饥,荷锄长啸兮,人皆醉矣莫我随。我知其免兮,不为世疑。君不见潇洒任公子,三年投竿东海水,安问悠悠天下事?”[1](P66)

这首诗写杨圻怀着不得志的心情远赴云水苍茫的南洋,过著荷锄种树的躬耕生活。“自我之生矣

① 所依据的版本为杨圻撰,马伟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② [唐]魏征等撰《隋书·志第二十六·地理下》云“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87页)

③ 中国古书记载了马来半岛的瘴疠情况,如谢清高(1765—1821)《海录》云“地多瘴疠,中华人至此,必入浴溪中,以小木桶舀水自顶淋之,多至数十桶,俟顶上热气腾出然后止,日二三次,不浴则疾发,居久则可少减,然亦必日澡洗,即土番亦然。”(转引自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7页)

④ 参考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朱杰勤《华侨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⑤ 按“星洲”即新加坡,此雅号是晚清福建海澄丘菽园(炜萼)所取。(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708册,丘菽园《五百石洞天挥尘》卷一)

⑥ 张百熙《江山万里楼诗钞跋言》称杨圻“清才美德,其人如玉”。(见杨圻《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第682页)

非所宜,翱翔南溟兮,云水苍茫之湄”之句,显然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大鹏鸟飞徙南海的典故。寓言中的“南冥”本来是一个虚拟的环境,后来的诗人喜欢用它来指称南海或者岭南地区,如宋之问《登粤王台》:“南溟天外合,北户日边开”^[3] (P651)、李群玉《送萧绾之桂林》:“一朝南溟飞,彩翮不可亲”^[3] (P6573) 即是。由于南洋的岛国大多濒临南海,所以也习惯被称作“南溟”^①。杨圻以大鹏鸟展翅高飞比喻自己的南洋之行,主要是为了抒发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逍遥感觉。此外,“任公子”的典故也同样出自《庄子·外物》篇^②。任公子投竿东海,经年不舍之下终于钓到大鱼,这个典故表示杨圻自己虽然不得志,但依然是心怀远大志向的。

至于那些使用了传说故事与文学母题的作品,则将新、马敷上一层神秘而迷人的色彩。试以下列两首诗为例:

庚戌路经交广南渡岛国居山泽间杂诗

山高月小海冥冥,一鹤归来宇宙青。

有客乘槎七千里,袖携风雨下南溟。(其三)

行尽花源烟霭生,翠微苍茫水纵横。

桑田万顷山深处,日落仙人叱石声。(其八)^[1] (P71)

如果紧扣题目的“南渡岛国居山泽间”来看,第一首诗中的“归鹤”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经·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4] (P121)。这诗句含有贤者虽然隐居却声名远播的意思,看来杨圻对自己的抉择是颇为自许的。第三句的“乘槎”典故,来源于张华《博物志》:“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上,多赍粮,乘槎而去。”^[5] (P111) 这个典故深受古代诗人的青睐,凡是使用了这个典故的诗作,都会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杨圻巧妙地将“乘槎”与“南溟”两者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南洋便成了与天河交界之处,进而染上了一层迷人的“仙气”。而“乘差客”的“奇志”,似乎也能够用来形容杨圻奔赴南洋的情况。第二首诗,直接将南夷岛国描绘成云水缭绕的桃花源,而“仙人叱石”用的就是牧羊童皇初平入金华山修道成仙后“叱石成羊”的典故^③。正如李白《古风》第十七首说的“金华牧羊儿,乃是紫烟客”^[6] (P125),杨圻运用这个典故来描绘夕阳下牧

童驱赶羊群的情景,传达出一种神仙般的恬静与悠闲趣味。

值得一提的是,“桃花源”不仅是杨圻南洋纪游诗中一个鲜明的意象,它有时还成为作品的主题内容。试以下列一首诗为例:

西溪行

余居南溟,往往独游深山大泽。柔佛西南山中,道如十里,草木蓬勃,贯以清流,阡陌井井。村中中国人数百,农业,长林美草间,鸟鸣花落,屋舍相依,鸡犬声相闻,苍然世外。问之,皆闽广人,仙人避乱入海,今不知其几世矣。余亦自喜暂游桃源,作《西溪行》。

西溪尽日泛孤舟,十里青山绿水流。

两岸飞花人不见,黄鹂千里满峰头。

忽闻人语清溪曲,溪尽平原山开屋。

洲上鸡鸣春昼长,云中犬吠人烟绿。

老翁肃客入山家,西舍东邻尽隔花。

争问中原今何世,乍闻战伐共长嗟。

此间岁月前朝历,不知治乱几更易。

自言避世隔人环,海上田园无消息。

相逢世外两无心,何如从此宿云林。

洞天人散花阴晚,柴门月上春山深。

仙人世世为农父,山中子孙今无数。

外边呼作武陵溪,居人不识桃源路。

送客含情问后期,重来莫自迷津渡。

平明日出照山村,开门满地榕花雨。^[1] (P54)

这首诗的抒写模式、语言词汇完全仿效王维《桃源行》,但不同的是,杨圻并非只依据陶渊明《桃花源记》去追摹怀想,他还多了身历其境的经验。桃花源是中国文人一个永恒的梦想,尤其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人们对它的想望就更加地强烈,像杨圻这首诗可能传达了一部分晚清文人的避世心理。这首诗的景物描写虽然受了母题的约束,但还是可以发现有些是诗人亲眼目睹的,比如说贯穿全文的“榕花”就散发出浓郁的南国色彩。

其实,如果从客观情况来看,杨圻眼中的“南洋桃花源”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相关史料告诉我们,许多华侨在南洋都过着艰苦耐劳的生活,几乎没有悠游自在可言。然而,毕竟杨圻的身份和目的有别于一般到南洋谋生的民众,他传达的是一个属于

① 如《清史稿》卷三四〇第3页云“以神灵显应,颁南洋檳榔嶼华商公所关帝庙匾额曰‘威震南溟’。”(转引自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第139页)

② 《庄子·外物》云“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鰌没而下,鰌扬而奋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8页)

③ 详细事迹见葛洪撰,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皇初平》,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卷二,第41页。

“土”阶层的心理感受。总的来说,杨圻将中国传统诗歌中的“桃源情结”在南洋继续延伸开来,而南洋也在他的妙笔下,彻底颠覆了以往人们心中所谓“蛮夷瘴疠之邦”的不佳印象。

二 最忆是“清凉”

四季恐怕是上天馈赠给中国传统诗人的最佳礼物。古人很早便发现,自然时序的更迭对景物带来的变化,容易影响人们的心情,从而激发写诗的兴致^①。大量的古典诗词告诉我们,诗人的悲、喜、哀、乐,往往与自然界的枯荣寒暑分不了关系。时序的变化触动了诗人的心绪,而诗人又将一切人生感受寄寓到大自然之中。数千年来,生长在神州的诗人们都乐意系身于这种循环的规律之中,并且享受其中的趣味。

钟嵘《诗品序》云:“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7] (P20)}实际上,中国传统诗人对春秋的喜爱程度要远远高于冬夏。春秋季节的适中温度,容易让诗人身心感到舒坦,神思活跃,不论积极抑或消极的情感和想法,都能在这基础条件上获得良好的抒发;相反的,暑热与严寒天气不是让人烦躁昏沉,就是神思壅塞凝结,不太有助于生发诗兴。因此,若与春秋题材相比,那些描写冬夏的诗词往往相形见绌。然而,中国传统诗人似乎并不介意这种偏爱,循环往复的时序,反而让他们甘愿置身在期待与失落的交替之中,固守着这样一种写作的抉择。

当杨圻远渡重洋来到南洋时,首先面临的是与中国迥然不同的气候环境。南洋地近赤道,终年平均气温为摄氏二十五、六度,因为时间词汇的不完善,而习惯被人称作“四季如夏”^②。也许和其他旅居南洋的诗人一样,杨圻很少会描写灼热阳光底下的景观,一些含有“避暑”的诗题^③,已经说明他不太喜欢在艳阳之下外出游赏。然而,杨圻并没有让陌生的环境浇熄写诗的兴致,他还是凭着诗人与生俱来的敏锐观察力,将南洋的地理环境特征勾勒了出来。比如“百卉无代谢,星象失躔陆”^{[1] (P46)};“山是四时绿,花为终岁春”^{[1] (P72)};“云霞连夜赤,岛屿入冬青”^{[1] (P82)};“白日风清畅,青云气色高”^{[1] (P89)}等。从南洋居民的眼光来看,这些凝练工整的描述还是挺贴切生动的。

杨圻毕竟受过传统诗学的严格训练,即使身处异域仍然写下了不少风味隽永的诗篇,而他心中那股诗兴的涌现,可说得力于南洋昼夜气温变化所带来的刺激,以及岛国江山形胜的感染。南洋的热带雨林气候,其日温差明显大于年温差,每当夜幕低垂时,暑热便开始消散,在习习海风的吹拂下,整个环境将变得凉爽宜人,这在中国江南的夏天里恐怕是罕见的。杨圻对大自然的巧妙安排感到十分之惬意,并且尽情享受著濒海岛国的滋滋凉意。从杨圻的南洋纪游诗里,可知他体会到的清凉程度似乎要超出一般人,甚至还等同于他所熟悉的“秋凉”。

如此秋光眠不得,高烧银烛照溪山。^{[1] (P44)}

(《秋夕》)

远水夕无浪,天河秋更明。^{[1] (P53)}(《山池夜起》)

海天深处仙人屋,清簟疏帘六月寒。^{[1] (P74)}

(《海上曲》)

芦苇兼天尽,江城五月秋。^{[1] (P89)}

(《西友约避暑海屿》)

骨冷神寒秋非秋,月落日出鱼龙愁。^{[1] (P93)}

(《海上曲》)

这些诗句几乎都是以星洲的江海做背景,再加上有“秋凉”之气贯穿其中以及日月的衬托,从而形成一种清朗无垠的境界。有趣的是,杨圻会在诗作中透露星洲的“秋天”正值农历的什么时序,如“六月寒”、“五月秋”,否则我们将无从知晓这“清凉世界”的具体描绘时间。能从星洲的夜凉体会出“寒意”,看起来似乎有点夸张,但正好反映诗人内心深处其实对晚清政局感到心灰意冷。

杨圻还喜欢将中国秋天常见的景色融入南洋的诗境中,比如“天风落红叶,飞满读书楼”;“红叶无风落,清川带月流”,显然都是晚秋的清美意境。虽然这些情景看起来不太真切,却正好说明,秋天已在中国诗人的精神上留下烙印。而这种创作构思,也反映了杨圻的诗歌宗尚。此外,杨圻笔下的“南洋秋色”,永远是那样的绿意盎然,像“过秋山更绿,入夕海生明”^{[1] (P73)};“蛮山秋更绿,海日夜先红”^{[1] (P88)};“北峰新雨绿,车马入秋荒”^{[1] (P75)};“石上扫松月,秋山移绿琴”^{[1] (P76)}的景色,都给人一种欣欣向荣之感,绝无萧瑟衰飒之意,这对中国传统诗人而言无疑是个崭新而奇妙的体验。可以这么说:

① 按:钟嵘《诗品》:“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② 关于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气候的论述,可见于中国的古籍,如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

③ 如:杨圻《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第87页《辛亥五月迁居蓝氏水园新楼避暑》。

杨圻的胸襟是开阔的,创作理念却是传统的。他愿意让南洋的江山风月来感染心中的性情,却选择在耳闻目见的客观环境上,营造出契合营造出契合自己审美意趣的诗境,尤其是唐人的诗境。

在当时“同光体”与“革新派”抗衡的年代里,杨圻的诗歌是独树一帜的,他传承着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一派诗歌中“清”的风格,而这风格基本上在他奔赴星洲之前就已被人认可。如《夜次白河县热甚舟中望月》被评为“清微淡远”^①;《城固县江上怀亲时由汉中旋里》被评为“与摩诘重阳诗同见天性”^{[1](P12)};《自襄阳游汉上望鹿门山》被评为“幽微深远”^{[1](P18)}。在郁郁葱葱的南洋岛国中,杨圻诗“清”的风格继续获得延伸,而且经常出现这样一个主题:凉风吹拂的夜晚,他倍觉精神抖擞,神思飞跃,静静欣赏着迷人夜景,体验生活中的闲情逸趣。

夏夕山月如水呼妇夜起煎茶廊下吟眉山冰肌玉骨

清凉无汗之句幽趣横生
开朗延皓月 移时月入室。
空江生夕明 夜绿参差滴。
喜呼妻不眠 相与赏佳夕。
湘帘半卷垂 琼户步响屐。
暗沼荷风来 幽槛兰气逸。
群山绕一楼 碧海当几席。
披衣拭玉盃 煎茶屏侍役。
月照茶烟青 茶烟向月白。
竟日斯时清 百念斯时寂。
佳景厌人多 清宵胜白日。
世人都昏睡 未解赏幽密。^{[1](P72)}

诗题中引用苏轼《洞仙歌》的千古名句,使全篇一开始就笼罩在清凉的氛围中。就好比他乡遇故知一样,杨圻从清凉之中体会到一份亲切感,并且对自己能“解赏幽密”感到十分满意,从而细心描绘出他所钟爱的诗境。这首诗的布局相当巧妙,像一幅逐步展开的画卷,景物参差错落其中,一派皓月清风,群山碧海,荷香茶气,颇具王、孟、韦的闲散风格。

中国传统文士普遍认为,诗歌风格会随着诗人所处环境的转换而发生变化,如杜甫夔州诗、韩愈潮州诗、苏轼黄惠儋三州诗,正好也印证了这个观点。南洋独特的地理环境,恰好使杨圻的诗在清美的基

本风格上发生变化,尤其当他欣赏著岛国层云舒卷、苍茫无垠的海景时,便体现出清旷超逸的一面:

看潮归去海西头 枕簟清凉水国秋。

铁笛一声烟吐月 百花深处海山楼。^{[1](P63)}

(《星洲清游诗》其一)

峡口潮凉云乱飞 风飘江雨点蓑衣。

贪看海上千山绿 吹笛骑牛缓缓归。^{[1](P71)}

(《庚戌路经交广南渡岛国居山泽间杂诗》)

南洲小吏似游仙 海上轻狂正少年。

吹笛一声明月出 水天无际两三船。^{[1](P74)}

(《海上曲》其二)

三首诗都散发着飘然自得之意,诗中风雅的“吹笛”举止颇有意思,看来杨圻屡将自己想像成远离世俗的高士。诗人这怡然自足的神态,正与《江山万里楼诗钞卷二卷三自跋》中“风月清夜,孤岛绝壁,高咏独啸,不知其极”^{[1](P684)}的情境相互呼应。

为了突显南洋月色的清亮绝伦,杨圻还喜欢化用张九龄《望月怀远》的诗境:

蓝氏水园夫妇月夕观荷

月满红衾香满袖 不须画烛照幽檐。

起来云水光中坐 无限清凉一卷帘。(其二)

椰林白露夜冷冷 流水清风一草亭。

相对移灯弄明月 一人吹笛一人听。^{[1](P65)}

(其四)

这些诗虽然没有着重描绘岛国环海的环境地势,然而,通过化用“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意境,诗中的空间画面仿佛在瞬间扩张,与深处的天涯海角非常契合。为了更好地欣赏荷塘月色,诗人与爱妻不惜灭烛移灯,体现对古人风雅之举的追慕。而云水氤氲、风清露冷、月光溶溶的空灵景致,又与他所眷恋的“清凉世界”牵系在一起。

从以上的诗例中可发现,杨圻所使用的意象基本上都散发出浓郁的中华色彩。这固然说明中国古典诗词的语汇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涵容性,能将异域景物和人事迅速“汉化”;但也正好揭示了开拓诗境所面对的难处。在对南洋草木风物多不知名的情况之下,杨圻所选择的拓境方式,还是尽可能的将南洋元素融入在他那带有唐人意境的“清凉世界”之中,如《蓝氏水园夫妇月夕观荷》的“椰林白露夜冷冷”,仿佛将海岛之畔的椰树移植到清冷的江南秋

① 杨圻《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第8页“集评”部分。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江山万里楼诗词钞正集》(2004年)目录第4页著录了“正集评点者”名氏:孙师郑先生、费仲深先生、曾孟朴先生、易实甫观察、张野秋尚书、范肯堂先生、杨莲府督帅、王晋卿中丞、阮斗瞻内史、李小溪参政、何郇威太史、康南海先生、李仲仙制军。

景之中,使奇特的美感在空间的交错中迸现而出。

清朝灭亡后,三十七岁的杨圻离开新加坡返回中国,旅居南洋的岁月虽然只有短短数年,却给他留下十分美好而隽永的回忆。在他一首约写于五十岁的作品中,就深深流露出对当时游赏经历的缅怀:

立秋夕与霞客检旧篋得南溟图照因忆旧游

披图今夕暗惊秋,十六年前万里游。

绿鬓朱颜风月夜,疏帘清簟海山楼。^{[1] (P378)}

看来,最令诗人难以忘怀的,既不是“云霞连夜赤,岛屿入冬青”的绚丽奇美,也不是“看尽千山雨,归来满屋云”的氤氲空蒙,而始终是那似秋非秋、亦真亦幻的夜幕凉意。正是在这股凉意的感染下,诗人的诗思才如泉涌般地迸现出来。相关作品中洋溢著的喜悦氛围足以证明,杨圻对于大自然的这份恩赐,应是深怀感激之情的。而当时尚未涉足南洋的中国诗人们,相信也能从杨圻的亲自试笔中获得启发。

余 论

在杨圻的南洋抒写中,“桃花源”与“清凉海国”最为突出,可说是中国古典域外诗的一次尝试性的开拓。由于杨圻是自求外放而并非遭贬谪,所以心情基本上是舒畅与愉悦的,他以“世外桃源”颠覆“瘴疠之邦”的形象,开拓了“海上田园”的意境。杨圻在长年如夏的星洲着意描写“秋凉”,可说是在客

观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联想,一方面其突显了杨圻所追求的审美意趣,另一方面也反映在时代背景中诗人的心境与人格。得力于南洋岛国江山之助,杨圻在王、孟风格的基础上拓展出清旷超逸的一面,然而却仍然回归到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之中。可以这么说,杨圻笔下的南洋,其地域色彩是比较淡薄的,他似乎更钟情于以民族特色凌驾其上。虽然南洋诗歌风格之塑造,尚需要等待之后一群长期寓居当地的诗人去努力,但杨圻对南洋景色的精彩诠释,已经给读者带来绝美的享受,并且对南洋产生无限遐想。

参考文献:

- [1] 杨圻撰,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2] 郑园.乱世飘蓬一诗人——杨圻诗歌论[A].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0年第4期.
- [3]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4] (宋)朱熹集注.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 [5] (晋)张华著,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6] (唐)李白著,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7] (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

责任编辑 雷 磊